



黄亭子札记

我是怎样去了北京电影学院的

王凤生

熟人朋友常常问起我，你一个学水利的怎么去了电影学院？我从清华大学去北京电影学院工作，应该不应该，成功还是失败，这都不是应该由我来回答的问题。但事情的起因与经过，我当时的一些想法，倒是该由我来述说的。

1991年，是我在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岗位上工作的第七个年头。当时我分管宣传、文科（文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）、职工工作和美育（美育委员会主任）。那一年3月15日晚，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同志叫我去他家，动员我去北京电影学院工作。这所学校是广电部的部属院校，党委书记面临退休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替。他希望我去。这件事对于我不是一件小事。我在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之后，基本未出清华园。文革时期，三门峡的五年，那也是清华大学的开门办学。至于后来去北大进修哲学一年，那只不过是每天往返于清华园与未名湖之间罢了，可算是未曾离开清华半步。

更使我拿不定主意的是几乎与此同时，有数个单位希望我去他们那里工作，如中央某部、北京某高校。中直机关的领导同志还曾打电话到我家里，动员我去中直机关工作。可选择的多了，反倒使人犹豫。工作调动，当然首先是组织上的协商与决定，其次才是征求本人意见。4月30日上午，我的领导，原党委书记李传信同志找我谈话，谈调电影学院工作之事。6月15日晚，我电话报告艾知生同志，同意去电影学院工作。在时隔数年之后的1997年6月2日，我去北京医院看望他，他还颇为认真地问起我：“去电影学院，你后悔不后悔？”语重心长地要我把它当作事业去做。在这次谈话一个多月之后的7月20日，他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如果硬要把我和电影拉到一起，那还得回到上个世纪50年代。我在长春读高中的时候，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《未完成的喜剧》。这是由我国最胖的演员殷秀岑与瘦形演员韩兰根合演的一部影片。在我就读的

东北师大附中学校前的马路上，殷秀岑满满地坐在一辆马车上，我们这些中学生，其中也有我，看着好玩，在后面追赶，有的还朝他扔石子，摸他的脖子。为此，在第二天的全校集会上，校长狠狠地教训了我们这些没有教养的顽童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拍电影。

第二次是在1957年的冬天，长影拍摄《红孩子》，我被选中作群众演员，饰演国民党兵。酬劳是半天五毛钱，还不是属于我自己的，要作为勤工俭学的收入交到班上去。摄影棚内，夜间，“红孩子”从墙上跳进院内。哨兵鸣枪示警，士兵们惊慌地涌出营房。我右手提枪，左裤腿挽到膝盖上，懵懵懂懂往外跑，边跑边喊。导演苏里坐在我们对面的小马扎上，冲着我们说：“同志们，你们喊的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呀！重新来。”就这样，一遍又一遍地试拍，一次我们还把房门给撞掉了。一位女演员的耳坠掉在摄影棚内，大家还帮助找。就是在那一年的冬天，

毛主席视察长影，《红孩子》里提着篮子的小女演员与毛主席还拍了一张合影。

我，一个对于电影少有了了解的理工男，何以决定到电影学院去工作？我有哪些思考？

人生要有多种体验。经历是财富，每一个经历都是一次新的学习机会。一个单位再好，如果一生只是工作生活在这一个单位，只有这一种经历，那也是不完美的。在清华，文革时期，工军宣队进校后，我在负责后勤的“校务组”的工作经历，使我对行政后勤工作有了切身感受。去一员工食堂蹲点，学到了办好食堂的“伙食经”，还有三门峡的经历等，都使我获得不同的人生经验。去电影学院也一定会有未曾有过的新体验。

要不断地挑战自我。我常有到新的地方去，接触生疏东西的欲望。73岁跑了个全程马拉松就是一次挑战自我的尝试。我不甘心于总是生活在理工科或综合大学，想看看艺术院校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天地。艺术教育与理工科到底有些什


么不同。

有比较才有鉴别。清华与北京电影学院是完全不同的两所学校。电影学院的经历会使我有机会学习艺术与艺术教育。比较两所学校，反观清华，对教育定会有新的认识与体会。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要认识一个事物，既要深入进去，也要跳离它。“鸟瞰”，方能窥其全貌。

对自己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恰当的判断。“人贵有自知之明”，正确地认识自己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情。人们往往对别人看得清，对自己则看不明白。怎样看我自己？我不适合从政，当教师、从事教育工作还有些经历，这是我对于自己的一个基本判断。所以我选择去电影学院而不去国家机关单位。

光有愿望是不够的，“胆量”也必须有基本条件做支撑。不熟悉电影为什么还敢去电影学院？对此我有这样两点认识：第一，电影是一种文化现象。不懂表演，不会演戏，也从无摄影、导演、录音的经历，但

可以从文化的高度去把握它。同样，在清华，我学的是水利，对于计算机、生物工程等我也是道地的门外汉。第二，电影学院是学校，不是电影制片厂。它是教育单位，不是电影生产制作单位。教育有共性，教育的一般规律对于电影教育同样适用。清华的经验在电影学院会有借鉴作用。以上两点是我去电影学院的思想支撑，也是对于我自己的另一个基本判断。

1991年9月16日上午，校党委书记方惠坚同志到我家作告别前的谈话，对我提出希望，也征求我对于学校工作的意见。就这样，我于17日离开曾经生活了33年的清华园，去了地处黄亭子的北京电影学院上班。如果有机会，我再接着说说到电影学院后遇到的问题，以及我是怎样开始工作的。

(2015年12月14日)

(王凤生，北京电影学院原党委书记、院长。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、校文科工作委员会委员副主任、美育委员会主任等职)